

说到近代中国留学的渊源，推重曾国藩和李鸿章者居多，但真正的“中国留学生之父”，却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容闳。

容闳：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容闳 (1828 ~ 1912)

□ 刘圣宜

1850年的耶鲁大学，可能不似今天这样显赫、知名，但在这一年，却发生了一件令中国人至今难以忘怀的事情：它吸收了一位名叫容闳的中国青年进校读书。20多年后，正是这位青年以中国官方代表的身份带领120名中国幼童横渡太平洋，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之先河。江泽民主席1997年访美、胡锦涛主席2006年访美，都特别提到耶鲁大学和容闳的名字，以此作为中美人民200多年友好交往的光辉例证。

耶鲁大学的大清子民

容闳于18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南屏（今珠海市南屏镇）的一个贫困家庭。7岁时，父亲甚至连送他进私塾的学费都交不起。是什么机遇使他进入美国的大学读书？

今天的人可能想象不到，晚清时期去国外读书是非常冒险和无奈的事。正是因为贫穷，容闳才被父亲送到基督教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这种学校不收学费且供食宿）。而因为想找到一份买办或通事之类的薪水较好的职业，容闳在马礼逊学堂毕业后，跟随老师布朗博士赴美求学。鸦片战争前后，交通还极其落后，远赴异邦骨肉分隔、背井离乡人地生疏，这使得国人把出洋视为畏途。

但是，容闳毕竟是受过9年西式教育的人，观念新，眼界比一般人开阔。在教会学校读书

时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意想之纽约游》，对西方神奇的世界充满了求知的渴望。1847年，他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纽约。

麻省的孟松学校是美国当时最好的预备学校，布朗博士为他和另外两名学生黄宽、黄胜办好了入学手续。两年后，容闳决心继续留在美国求学并把考入耶鲁大学作为努力目标，他对渴望他尽快回乡挣钱养家的母亲说出了这个愿望，请求她的谅解。容闳说：“自从来到这个国家，我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英语，到去年冬天又学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以求符合大学的要求。”

入学考试可以凭自己的努力，但学费如何筹措呢？孟松学校有一种为贫困生设立的奖学金，但受资助者必须签订一个合约，承诺毕业后当一名传教士。容闳拒绝了，他认为传教并不能使他为自己的国家谋取最大的福利。布朗博士想方设法为容闳争取到一个妇女协会的帮助，终于使他如愿以偿。

作为耶鲁大学也是美国大学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学生，容闳的表现令人钦佩。他的同窗好友白博士在60年后还以非常欣赏的口吻对他的学生、留美的胡适说：“开头，容闳的异服异俗颇受人笑，但他两次在班上的英文比赛中得到一等奖后，便无人敢揶揄他了。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背后拖着一条小辫子的容闳很快就成为校园人物。”但容闳内心却是孤独的，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中国政治腐败、民不

聊生、内乱蜂起的消息使他心情沉重，坐立不安，他说：“我要使我们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到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

容闳在美国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后，认为复兴中国的道路须从学习西方开始，这种认识在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无人能及，在国人对世界知之甚少的年代里，容闳是真正了解西方的第一人。沟通中美文化的历史重任落在他的身上决非偶然。

1854年，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因为有容闳这位大清帝国的子民而显得颇为轰动。知名学者布什内尔特地从哈特福德城赶来，为的是结识这位在报刊上谈论中国问题的青年。从容闳的毕业照可见，他已经剪去了辫子，外表完全西化。因居留美国已久，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而回国的前景是黯淡的，他甚至连本国的语言也几乎忘记了。但正如他的好友吐依曲尔所说，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不会让他图私自利，不管前途如何，他还是决心回去。

艰难的破冰之旅

1854年，容闳怀着满腔热情回到中国。从这一年归国到1872年他带领首批留美学生重新走进美国校园，整整经历了18年，其中的艰难曲折，恐怕是他从耶鲁毕业时远未料到的。在守旧盈廷的晚清，一个平民百姓要说服政府往国外派出留学生，几乎是痴人说梦。

刚踏上故乡的土地，容闳就目睹了一场血腥大屠杀：两广总督叶名琛残酷镇压响应太

平天国的陈开、李文茂起义。政治的动乱使他无法提出自己的教育设想。1855年至1863年，他先是在香港高等法院当译员，后到上海海关当译员，又曾在英商公司做书记，都为时甚短，经常失业。在动荡漂泊的生活里，他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广州刑场上目睹叶名琛滥杀75000多人的兽行使容闳认为，太平天国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残暴的清王朝。1860年，他走访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向干王洪仁玕陈述了包括政治、军事、实业、教育的7点建议，因为与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一致，他还提出以基督教的圣经取代中国的伦理道德。洪仁玕很重视他的意见，但当时太平军正在打仗，无法实行。经过观察和分析，容闳对太平天国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产生了怀疑，最终没有接受洪仁玕授予他的“义”字四等爵封号，失望地离开了天京。

为寻求实现理想的依托力量，他于1863年进入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府。曾国藩网罗容闳的目的是想办军械所。值得一提的是，他成功地说服曾国藩把引进机器母机作为起点，使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少走了一些弯路。1865年机器运回中国，筹建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机器工厂——江南制造局。容闳因精通西学而曾被曾国藩器重。1868年，容闳首次向洋务大员丁日昌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设想，得到丁日昌的大力支持，但丁的条陈却被“留中不用”。当时洋务派正遭受守旧派的攻击，其中一条罪名便是“以夷为师，可耻孰甚”！

容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



1847年，布朗牧师（左）携容闳（中）、黄胜（右）及黄宽赴美

化者也。”他对曾国藩没有失去信心，只是静待时机。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容闳充任译员随丁日昌到天津协助曾国藩处理教案。中外冲突虽暂时平息，但民心难平。容闳再次向丁日昌提出留学计划，并以教案为例说明中西增加了解、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丁日昌的游说下，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入奏派遣留学生，很快得到皇帝批准。

10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容闳惊喜交集，夜不能寐，他写道：“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事。”并预言，此事将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开一新纪元。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美国驻华公使卫三畏对此均表赞许。伦敦、纽约的报纸很快就报道了这件新鲜事，对清政府的开明举动表示欣喜。

容闳在写给自己的老师、耶鲁大学校长波特的信中郑重地谈及中国政府的意图：“派遣幼童赴美接受完整教育，以备将来在中国政府各部门服务……他们不得入美国籍，或留美不归，也不得中途退出自谋他业。因为他们是官费学生，正如西点军校和海军官校学生对美国政府有应尽的义务一样。”

1872年8月11日，詹天佑等第一批30名幼童穿上官式丝绸长袍，束装就道，于9月12日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中美两栖人”的困厄

容闳在澳门和香港的教会学校读书9年，赴美留学8年，系统接受西式教育共17年，知识结构和道德观念已于此时定型，可以说是全盘西化。从1854年回国至1912年在美国去世的58年时光里，容闳有20多年生活在中国，30多年生活在美国，可以说是一个“中美两栖人”。

他崇尚美国文化和制度，信奉基督教，早在1852年就归化为美国公民，后又娶美国女子为妻，视美国为第二祖国。同时，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始终保有一颗中国心。但他很难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特别是介入清政府的权力结构之中，甚至难以得到某些权势人物真正的信任、接纳和支持，这对他的事业是一个严重的制约。虽然他手定留学计划，但由于没有科举入仕的背景，只能充当副职。李鸿章认为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

当容闳第一次回国时，在香港的海域上，

竟不能用中国语说出“暗礁”和“沙滩”，自己也颇为尴尬，后来不得不花半年时间向一个外国传教士学习粤语。由于他的中文根基甚浅，日后他的条陈基本上请人捉刀，而其生平自传《西学东渐记》也只能用英文写成。虽然如此，他对晚清政府的种种黑暗，感受却比别人痛切，提出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思想也为国内最早。而他的大多数设想落空、行动失败，除了客观原因之外，也和他的边缘人身份有关。

幼童留学方式及其实施对保守的中国来说实在是太激进了，引起很大的争议，因而不断地遭受来自各方的猜疑、干扰甚至破坏。不但守旧派认为幼童“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学成亦不能为中国用”，连号称洋务干才的驻法公使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也说：“幼童未读中国圣贤书……专事西学……于国家无大益也。”而与容闳共事的历届留学事务所正监督囿于狭窄的知识范围和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幼童的游戏、运动、剪辮、信教等西化倾向统统视为大逆不道，攻击不遗余力。容闳与他们激烈争论多次，结果李鸿章命他不要固执己见，对幼童也不必多管，从此，正监督吴子登把持了出洋肄业局。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爆发经济危机，掀起排华浪潮，中国留学生要求进入军事学校也遭拒绝，使清政府感到花费如许金钱送学生出洋殊为不值。1881年，朝廷谕令4批共120名留学生全部回国，其时只有詹天佑、欧阳庚从耶鲁大学毕业，其他学生都正在各大、中学就读。中途退学，不论对学生本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损失。

留学计划中途夭折，容闳一生的梦想归于破灭，不由得仰天长叹：“苦心孤诣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是我对中国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可行的办法。随着120名留学生的召回，我的教育事业也从而告终。”

虽然如此，令容闳稍感欣慰的是，120名幼童回国后在各自的领域努力工作，为推动中国近代化作出出色的贡献，其中有“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邮电业奠基者朱宝奎，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中国第一代海军将领容尚谦、蔡廷干、徐振鹏，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唐绍仪……

这些事实证明，容闳无愧于“中国留学生之父”的美誉。

“从头到脚，他身上每一根神经都是爱国的”

容闳的报国之心，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已经树立。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回忆当时立下的志向：“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用，不必遂大有所为，或亦不难造一新形势。”所以当留学计划横被摧残之后，他仍然始终如一地关注着中国的盛衰安危，尽管他已失去政府官员的身份。

1883年，正在中国述职的容闳因为美籍妻子病重而返回美国，1886年，爱妻病故，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容闳“以严父而兼慈母”，尽心尽力抚育儿子成长。在幽居的日子里，容闳心系故国，郁郁寡欢。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容闳写信给他的旧相识、时在主战派张之洞幕下效力的蔡锡勇，提出一个向英国借款募兵购舰与日决一死战的建议。张之洞决定委派容闳赴伦敦筹借款项，容闳当即赶往英国。正在洽谈之际，借款之事被李鸿章否决，张之洞奏保容闳归国效力。容闳把张之洞的电召看成是祖国的召唤，心潮澎湃。他把两个正在读中学和大学的儿子托付亲戚朋友照管，毅然归国。

1895年，阔别祖国13年的容闳回到上海。此时，中国已经战败并签订了屈辱和约，容闳有关自强新政的建议也因太新太激烈而未得到张之洞的采纳。1898年，“百日维新”发生，改革风潮遍及京师。维新运动的发起人康有为、梁启超认为“容纯甫非常才人也，可以为胜、

广（陈胜、吴广）”，容闳的寓所成了他们秘密集会之地。当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发兵勤王之夜，梁启超便在容的寓所等候消息，后来得知袁不能举兵清君侧，才决定避走日本。戊戌政变发生后，容闳因有涉案嫌疑，逃到上海租界避祸。

在“托迹租界”的日子里，容闳并未停止谋求维新的政治活动。1900年7月20日，他与维新人士唐才常等组织“中国国会”，被推选为会长。容闳用英文起草了中国国会自立军的对外文告，明确宣告要建立一个立宪政府，废除慈禧太后及其老朽顽固派，恢复光绪皇帝的权力，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予之人民。自立军起事失败后，容闳被通缉，不得不逃亡日本、隐居香港，最终被迫回到美国度过他一生的最后10年。

对清政府完全失望的容闳决心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邀请孙中山到美国，请军事家荷马李和财政家布恩与孙中山会谈，商定发动起义的事宜，给予孙中山极大的鼓舞。不幸，筹划中的“红龙计划”因为筹款无着而搁浅，容闳也病倒了。1912年初，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83岁的容闳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立即写信给香港的爱国华侨谢纘泰，请他代向孙中山致贺，并说：“我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或许会到中国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孙中山热忱邀请容闳归国辅政，称他为“老同志”，但邀请函寄到美国时，容闳已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于1912年4月21

日病逝，终于未能回到他魂牵梦萦的祖国。他死后，他的两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儿子遵循他的遗愿，先后回国服务。

美国牧师吐依曲尔于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大学演说中以诗一般的语言赞美容闳：“从头到脚，他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山河和伟大历史。”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部分留美幼童在旧金山的合影